

彭 真

赵 晋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①

—

彭真原名傅懋恭，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埕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上学期间，自立字“敬之”、“温卿”，参加革命后曾使用过“春雷”、“炜实”等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

彭真祖籍山东省桓台县侯庄乡玉皇阁村。其祖父于1888年带领全家逃荒到侯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家人艰难度日。10余年后彭真出生。在其父傅维山辛勤操劳下，家境逐渐好转。

埕上村的农民主要靠种菜维持生计。彭真11岁时，就跟着父亲到侯马镇卖菜。从此他开始广泛接触外界社会，增长了见识。晚上，他凑到村中更房听人们说东道西、讲故事。彭真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故事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

《彭真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人民日报》1997年5月2日。

1914年 彭真 12岁时 开始在村中私塾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彭真的睿智与勤奋好学,使他在 4年私塾生活中,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等 而且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少年彭真深为梁山好汉杀富济贫的英雄行为所感动。

1918年,彭真以优异成绩考入设在侯马的曲沃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为减轻家里的负担 彭真坚持不在学校入伙 常年走读。课余假日 还要回家磨豆腐、干农活、卖菜。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彭真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由于他的革命主张和在学生中的威望,被同学们公推为二高宣传队长。他带领同学上街游行或演讲 宣传抵制日货 打倒列强 振兴中华。次年,他又被推选为二高学生会主席。

1922年 9月,彭真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到太原读书。省立一中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山西省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祥地。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高君宇就是该校毕业生。彭真到校不久,就与在校内开展革命活动的贺昌、王振翼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相识了,并参与管理由贺昌创办的省立一中青年会,倡导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彭真还担任了由青年会设立的平民小学校长。从此,彭真和他同时代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品。彭真热衷于平民小学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工作,他讲课时常能联系实际,很受学员欢迎。

1923年 5月,彭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经高君宇、李毓棠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 彭真已经确信 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自己的道路,也是中国唯一的路。从这个时候起,彭真已经下定决心为中国走向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4年春,太原的共产党员发展到 7人,在省立一中成立了党小组 李毓棠、彭真先后任组长。彭真还被推选为省学联委员 并

先后负责太原团地委平民和学生部的工作。1925年1月根据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团章，太原团地委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彭真任书记。1925年3月，彭真任中共太原支部书记，并以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山西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任省学联副主席、党团书记，成为省市学生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彭真还先后指导成立了山西工人联合会和太原市总工会。在彭真领导下，太原广大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发动罢工、罢课斗争，使革命力量的影响逐步扩大。彭真直接参与领导的反房税斗争、印刷工人罢工斗争和反帝爱国斗争，都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鼓舞振奋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精神。

二

1925年8月，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组织调彭真到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工会工作，任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负责党的工作。从此，彭真成为以从事革命活动为主的职业革命家。

彭真到石家庄后，立即与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袁子贞、高克谦、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施恒清^③等接上关系。此时，正太铁路工人正在进行“买米斗争”，彭真立即投入组织领导这一工人斗争的工作中去。

正太铁路是由法国资本家独资经营的。在法国资本家和奉军操纵的石家庄警察当局的统治下，共产党领导组织的铁路总工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只能在暗中活动，被称为“外工会”。法国资本

袁子贞(1887—1927)，1922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旅法华工领袖。

高克谦(1906—1925)，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学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③ 施恒清(1894—1941)正太铁路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家收买、支持的合法工会被称为“里工会”。法国资本家每月免费发一趟车，到山西省寿阳县一带购进价格较便宜的米面卖给工人。“里工会”负责买米的人营私舞弊，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外工会”发动广大工人展开斗争，争取买米权。经过广大工人团结一致的罢工斗争，终于夺回买米权，为广大工人谋了利益。“外工会”在工人中威信大增。不久，买米权又被剥夺。彭真、袁子贞领导正太铁路总机厂工人包围了法国资本家的办公大楼。在军警步步近逼之下，为了避免流血牺牲，总工会指挥工人回厂复工。通过这次斗争，极大地增强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在工人中的凝聚力。

买米斗争后，石家庄工人斗争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彭真等领导人在工人中深深地扎了根。为了打击和破坏正太铁路总工会的革命活动，石家庄警察厅于1925年9月中旬突然派便衣特务袭击了彭真等人的住处。当时，彭真夫妇外出未归，袁子贞越墙逃去，高克谦未及脱身遭到拘捕。大批警察闯入正太铁路总工会所在地，逮捕10余名工会积极分子，并将工会查封。

高克谦等被捕后，彭真、袁子贞等多方设法，积极营救。在发动工人探视、慰问、交涉、游行示威的同时，又通过上级工会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求援电。广大工人愤怒谴责军警暴行，舆论一片哗然。反动当局一方面欺骗群众，一方面仓皇下毒手，秘密杀害了高克谦。由于反动当局加紧镇压群众，石家庄陷于白色恐怖之中。袁子贞奉调赴唐山工作，正太铁路总工会领导人中，彭真只身留在石家庄坚持斗争。

1925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赶走驻石家庄的奉系军阀。由于国民军同情群众的爱国行动，石家庄的形势趋于好转。彭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领导正太铁路总工会公开恢复，由王凤书^①任委员

王凤书（1887—1935）正太铁路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不久，中共北方区委、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王警昆（王鹤寿）到石家庄。彭真、王警昆组织领导石家庄京汉铁路工人建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分会，王警昆任秘书。此后，彭真、王警昆领导的两个工会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壮大了铁路工人的力量。彭真、王警昆领导广大铁路工人严惩了参与杀害高克谦的工贼，对高克谦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

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北京中法大学共产党员王光宇（王斐然）到石家庄，与彭真、王警昆共同组成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王光宇任书记，王警昆兼任青年团石家庄特别支部书记。石家庄特支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建党、建团、建立工会组织。在特支领导下，石家庄党团组织和工会迅速发展壮大，仅正太铁路总机厂就有数十名工人被发展入党。

这一时期，彭真把工作重点放在拥有 3000 多名工人的大兴纱厂，该厂是石家庄规模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由于受到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工人生活困难，政治地位低下。彭真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建立了大兴纱厂工会。1926年2月上旬，在彭真、王光宇组织领导下，大兴纱厂工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一、制作工会徽章发给工人；二、不准资本家、工头打骂和开除工人，工人犯错误由工会处理；三、提出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 16 项条件，其中包括实行“三八”工作制，建立工人学校、俱乐部、合作社、食堂、医院、疗养院，女工分娩休假 10 天，工人因工死亡进行抚恤，工伤休假工资照发等。会后，工会用工人的捐款制作了厂徽作为会员进厂证件，不再使用资本家发的手折。上述措施，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使广大工人以高涨的革命热情紧密团结在工会周围。

1926年3月，在直、奉、晋各军阀部队联合进攻之下，国民军被迫撤离石家庄。阎锡山的晋军占据石家庄后，白色恐怖再度袭

来。反动派收买打手，制造事端，于 3 月 29 日夜对工人发动突然袭击，致死 3 人，重伤 10 余人。彭真立即组织工人罢工，发动大批工人包围工厂，缉拿凶手。资本家置工人的严正要求于不顾，进一步勾结军警，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大兴纱厂工会被查封，4 名工人领袖被捕，工人代表、纠察队员和工会积极分子 150 人被开除，并下令通缉彭真等人。大兴纱厂持续 20 余天的罢工斗争被镇压下去。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彭真在工人掩护下多次转移仍不能存身。1926 年 5 月，中共北方区委调彭真到天津工作。正定县党组织负责人立即护送彭真抵天津。

三

彭真到天津时，中共天津地委将下属组织分为三个部委员会。一部委主要工作对象是海河西岸纱厂和地毯厂；二部委主要工作对象是租界以北地区的纱厂、地毯厂、铁路和学校；三部委主要工作对象是租界内的行业工会。1926 年 7 月，彭真接任二部委书记兼宣传委员，不久调任一部委书记兼宣传委员。8 月，彭真提出建议并直接领导了北洋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工人罢工的强大声势下，资方被迫同意为工人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此后，彭真又领导了裕元、宝成、裕大等厂的工人运动，各厂工人斗争逐渐活跃起来。

彭真在与工人群众接触中发现，许多工人对练武术颇有兴趣。彭真的祖母早年习武，在乡间团结了一批喜好抱打不平的农民。把自幼的耳濡目染与工人群众的爱好结合起来，彭真找到了团结工人骨干的有效方式。通过兴办武术馆，团结了大批工友。彭真从中选择骨干分子加以培养，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在裕元、宝成、裕大纱厂，彭真都曾以组织群众习武的方式团结广大工人，进而发展党

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彭真在领导裕元、北洋纱厂工人运动的同时，还组织领导了两个纱厂附近的小刘庄、小滑庄、东楼、西楼、贺家口等相邻 5 个村的反霸斗争。5 村农民遭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欺压，不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彭真经常深入到广大农民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斗争觉悟，引导农民起来进行反抗恶霸的斗争。5 村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于 1928 年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增租，保护佃权。1929 年 6 月彭真被捕入狱后，他发展的党组织仍继续领导 5 村农民的反霸斗争。1929 年夏末，曾发展到组织 6000 余农民包围了河北省高等法院，迫使法官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

1927 年 8 月中共顺直省委^①成立后，将天津地委改为市委，书记李季达，彭真任宣传部长。8 月，李季达被捕，彭真代理书记，11 月任书记。当时，顺直省委决定在北方发动大暴动。玉田暴动很快被奉系军阀镇压。彭真被派往唐山组织暴动。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彭真决定不在唐山发动暴动，被扣以“右倾”帽子。北方暴动这一过左的行动计划，使天津、北京、京东一带党的力量遭受很大损失。事实证明，彭真根据主客观因素作出不实行暴动的决策是正确的。

1928 年 1 月，中共中央为了解决顺直省委原书记彭述之的错误造成的工作失误，调省委书记朱锦堂、中央巡视员蔡和森到上海汇报工作，顺直省委书记由彭真代理。后省委书记先后为王藻文、韩连惠，彭真任常委、组织部长。1928 年 2 月，彭真曾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周恩来、罗亦农、瞿秋白等汇报工作。

1928 年 7 月，在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

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

扩大会议。会后，彭真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身份负责天津党的工作。

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传达了中央对省委工作的指示精神。彭真向周恩来汇报了天津的工人运动等情况。12月下旬，省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并进行改组。改组后，彭真被省委任命为中共天津特区委书记。1929年2月，又被任命为中共天津特区委书记。

四

1929年6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彭真被国民党天津当局逮捕，关押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彭真入狱后，一再叮嘱被捕的党员要咬死口供，不乱供，不指供，使国民党军警无法得到新的线索，使狱外党组织免于遭受进一步的破坏。彭真又抓住一名政治犯被折磨致死的事件，秘密串联狱中难友，发动广大政治犯团结起来与狱方进行斗争，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彭真还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在报纸上公开揭露监狱中的黑暗生活。狱中党员以彭真为核心迅速团结起来。不久，狱中秘密党支部建立，彭真任书记。狱中党支部领导政治犯们互相保护，设法使未暴露身份的党员混过军警的审讯，同时努力争取狱外支援。

第三监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间不足10平米的囚室，关押5—10人，大小便在屋内，臭气熏天。吃的小米既臭又有砂子。看守随意打骂“囚犯”。彭真与党支部成员研究后决定，利用狱方内部矛盾和弱点，实行合法和非法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狱内斗争和狱外斗争相结合，通过绝食斗争，改善狱中生活条件。

由于政治犯的正当要求未得到答复，1930年7月2日，在狱中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第三监狱120余名政治犯全部绝食。按照

党支部事先安排，向狱方提出 8 项书面要求，主要内容为改善伙食、除去刑具、白天开放监门、改善病人待遇、允许阅读书报等。狱中党支部还明确提出了三项纪律：1. 无论狱方使出何种手段 都要坚持一致行动，不准单独复食；2. 按党支部要求开展斗争，不得超越规定砸门毁物等；3. 不得向狱方泄露斗争计划等情况。

绝食开始后，狱方使出各种伎俩进行破坏，政治犯们坚持绝食不动摇。绝食到第 5 天后，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狱方基本答应了各项条件，彭真等决定复食。绝食期间，彭真被转移到天津陆军监狱关押。第三监狱仍按原党支部的部署，又曾进行过多次绝食斗争。

五

1931 年 5 月 18 日晨 彭真等 30 人被押上囚车，转赴北平。囚车开进天津北站，政治犯们被聚集到站台一隅候车，四周布满持枪士兵。彭真伤病初愈，身体还很弱，但此时却显得格外沉静。他和几名在三监时的支委趁机若无其事地靠拢在一起，迅速交换意见。商定：不管敌人施展何种伎俩，决不放弃斗争的权利。如果北平监狱同三监待遇差不多 就不绝食 先熟悉情况 加强内部团结 争取尽快打通与狱外党组织的联系；如果待遇恶劣，就立即进行绝食斗争，争取改善生存环境。彭真特别强调：今后各方面条件必将更加困难，要鼓励全体同志紧密团结，坚持斗争，争取胜利。意见统一后，支委们分散开，利用候车及乘车途中的时间，向大家作了传达和动员。

到北平后 彭真、刘文蔚、刘秀峰、赵奎昌、刘慎之、田世勋、刘克让、张炳之、张凤歧、万咸宁、吕少洪、蒋宗华等 15 人被点名去二监 其余 15 人去一监。

北平河北省第二监狱坐落在德胜门外下关以北，旧为顺天府习艺所，由功德林庙宇改建。1931 年改称宛平监狱，次年又改称北平第二监狱。彭真被关进一间不超过 4 平方米的小屋。

二监每日两餐 上午 9 时 下午 4 时。第一顿饭 政治犯们每人分得两个黑乎乎的玉米面窝头，一碗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汤。彭真明白 敌人在使下马威 用慢刀子杀人。如果一声不吭任凭宰割 等待 15 位同志的将是更加悲惨的命运。于是，尽管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 他仍把‘饭菜’退回去 大声要求见监狱负责人。关在同一监筒的难友们听到声音纷纷响应，一致要求与三监相同待遇。然而，看守们似乎早已接受了指令，对政治犯们的要求冷冷地不予理睬。愤怒之下，彭真等按照事先约定，人自为战，开始了来到二监后的第一次绝食斗争。此后，政治犯们的生活待遇有了些提高，窝头不再是糠多面少了。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的抗争，狱方不得不把关押在独居监室的“重案犯”转到普通杂居牢房，三五个人住在一起。当然，他们与普通刑事犯仍旧是严格隔离的，也不允许做工，不允许与外界通信、会见。

能够朝夕与同志相伴，这已经使政治犯们在精神上感到很大满足了。彭真与刘文蔚、刘慎之、刘秀峰等在一起 他们很快就成立起以彭真、刘文蔚为领导核心的党支部，共同组织难友们开展灵活有效的狱中斗争。

北方的冬季降临了。11 月 北平已是寒气逼人 监狱里却不生炉火 牢房内冰冷难耐。政治犯们仅靠单薄的棉衣被 难以御寒。他们几次向看守长提出生火炉的要求，均被拒绝。

到了年底，牢房四壁都挂了冰，几个身体弱的难友被冻病了，彭真患有肺病，最怕受寒发烧。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他们不断向狱方交涉，要求生火炉。他们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到监狱中下层对“生炉子”要求的同情，终于迫使狱方同意在监筒里生起

火炉。

在半年多大小数十次斗争中，彭真很注意通过实际行动考察党员。同牢房的年轻难友刘秀峰，原在顺直省委负责保管文件及发行工作。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突然被捕，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无意中将自己的住处说出，造成一些党内文件被敌人搜去，一个同志被蹲守的敌人抓捕的后果，因此受到三监狱中党支部不定期留党察看的处分。转来北平二监后，刘秀峰没有背包袱，仍以昂扬的斗志与敌人作斗争，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不怕迫害不怕牺牲的果敢精神。经过二监党支部的研究，由彭真亲自向刘秀峰宣布撤销处分恢复党员权利并设法通知狱外党组织。刘秀峰非常激动，表示不辜负组织信任，更加自觉地磨炼自己的党性，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大赦案》，规定凡于1932年3月前判刑者均减刑三分之一。据此，彭真的刑期由9年减为6年。

1932年春季，狱外田野间已是万物复苏了。牢房内，15名政治犯却因长期营养不良、环境恶劣而日渐瘦弱。一年来，经过多次说理斗争，只迫使狱方在有限范围内作了一些让步。于是彭真等开始考虑再次使用“绝食”这一武器以“求死”来图生存进一步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待遇。

4月2日，各校学生代表组成的参观团来到二监。政治犯们乘机提出了改善待遇的五项要求：1.改善伙食，吃大米白面；2.给政治犯下掉脚镣；3.要有看书学习的自由；4.冬天每个监室生一个炉子；5.有买东西的权利等。同时表示：不答应条件就绝食，要求学生到外面向舆论代为呼吁。狱方声称政治犯们要暴乱，命令看守把他们拖回牢房，锁起来。典狱长乘机把学生们带走了。

被拖回牢房并重新钉上重镣的政治犯们，立即宣布开始绝食，

不获胜利决不复食！

开始，狱方并未将政治犯的绝食放在心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是第 10 天了。政治犯们仍然静静地躺在床上。看守长慌了，三番五次地跑去找上司报告请示。典狱长无奈，只好同意先答应政治犯改善待遇的要求，按病犯待遇，每人每天 6 两米、6 两白面。彭真等见斗争已取得初步胜利，便同意了复食。不料，生活改善了仅 10 天，狱方又出尔反尔，取消了所答应的条件。被激怒的政治犯们毫不在意体力尚未恢复，马上宣布再次绝食。双方的较量很快进入白热化。15 天后，彭真、刘文蔚、刘秀峰、刘慎之、田世勋、刘克让等 6 人仍在坚持，显然，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斗争的最高目标已不是求得生存条件的改善，而是要告诉敌人：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的意志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二监绝食风潮的消息已在外界传开，狱方无力承担将政治犯虐待致死的责任。绝食期间，他们将彭真等 6 人集中到一个号子里，强行撬开他们的牙关强灌盐水和米汤。但 6 人坚持不妥协，灌进去又吐出来。绝食到第 21 天，典狱长不得不宣布无条件答应政治犯提出的五项要求。

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彭真与难友们利用生活条件改善之机，将主要精力转向恢复体力和读书学习。与彭真关押在一起的 14 名政治犯，原来大都是一些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并没有很深入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彭真提出的书目，通过狱外党组织，他们搞到了不少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马列书籍。由彭真亲自辅导，从《共产党宣言》学起，大家一起学习探讨，从马列主义原理到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无不是他们求索的天地。黑暗牢房倒成了他们难得的课堂。当时，在张学良控制下的北平，监狱当局仍然依照“严防秀才造反”的老理儿，禁止政治犯们阅读“水浒”、“三国”一类造反生事的书，而对他们研读马克思列宁那些“洋玩意儿”却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4年10月，刘文蔚、刘慎之等4年刑期已满，在准备出狱时，驻北平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派人来见他们，告之必须要履行反省手续，发表反共声明才能出狱，遭到断然拒绝后，便把他们转押到草岚子“北平军人反省院”。在那里，他们与薄一波等一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狱中斗争中。

1935年8月，彭真和刘秀峰1932年减刑后的6年刑期已满，狱方按照以往惯例，将他们即将出狱的情况行文省党部，但信被退回。当年6月，国民党在日本关东军威迫下，与日方达成“何梅协定”。按此协定，其河北省党部连同北平、天津市党部，都已于不久前摘掉牌子，移迁保定，信件无人接收。狱方直接请示南京司法部，不久得到复电：释放。

出狱后，彭真到天津寻找党的关系，刘秀峰去了保定。1935年秋，彭真任中共天津市工作组负责人。1936年春，彭真调任中共北方局驻冀东代表，主持改组了中共京东特委，重建中共冀热辽特委。

六

1936年夏，彭真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1936年9月，蒋南翔（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徐高阮（又名徐芸书，1936年初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分别写信给北方局，谈了北平党内意见分歧情况。

北平党内的分歧意见起源于关于入党条件问题的争论。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

勇战士 都应该吸收入党。^①在北平党内，以徐高阮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凡是积极拥护抗日、坚决抗日的 就可以入党。一些党龄较长的同志则认为：我们共产党员从来都是以承认党纲党章，承认共产主义为标准的。不能凡是抗日的积极分子就都能入党，不能够降低共产党员的标准。徐高阮等认为市委过分强调组织的纪律性和纯洁性 工作死气沉沉 老同志多是“关门主义”老一套 难以教育过来 说“旧瓶不能装新酒”，主张撤换这些同志。1936 年 徐高阮等人甚至在《学生与国家》、《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青年思想独立宣言》、《论共产党问题》等文章 公开倡导青年们拒绝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提出“青年运动必须让真正的原始感情支配”，“莫再傍人门墙 好回到自己的天真 树立起自己的意见”引导青年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对学生运动提出“无条件统一论”，主张解散学联，解散民先队。徐高阮与中共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人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赵德尊等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意见。在北京大学，与徐高阮持相同观点的人也与李昌、陆平、刘居英等共产党员激烈辩论。当时北平党的领导机关内部也对如何领导学生运动存在意见分歧，工作中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种状况影响了北平党的工作的正常开展。

1936 年 8 月 中共中央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 实行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8 月 25 日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同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给各级党部发出指示信 指出：“深切的研究与学习党的新策略，利用一切运用联合战线策略的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与同志，根据新策略的精神来改造各地党的全盘工作，完全克服关门主义与空谈的错误，就成为各地党部工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版，第 622 页。

的极重要的一环。”

北平党内意见分歧的状况和当时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严峻斗争形势的需要不相适应。为了改善北平党的领导，消除党内意见分歧，加强对北平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1936年9月刘少奇派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到北平指导工作。

1936年九十月间，彭真找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听取情况汇报，又找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赵德尊了解情况。之后，彭真到清华大学住地下党员杨德基（杨述）处，了解清华大学党组织情况，曾找蒋南翔、徐高阮谈话。最后，他对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的工作给予肯定。在北平，彭真还找很多党员谈话，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根据党的新策略，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执行情况，彭真对中共北平市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

1. 从政治领导上来检查，存在的问题是：只有一般的政治号召，没有抓紧现实的事变和机会开展群众运动，不会动员群众进行公开活动，使政治斗争脱离群众的日常斗争；指出应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合法运动和合法手段来进行公开活动；应该特别注意群众需要什么，要作些什么，能作些什么。

2. 从组织生活与领导方式来检查，存在的问题是：只注意机械地服从组织，因而束缚了同志们的创造性，并且忽视了开展工作；指出要相信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创造性，要把党的决议和指示传达给他们和他们议论，使他们自觉地接受、消化、吸收，成为他们自己的意见，并且能够灵活地运用，使每个同志都能充分地发挥其创造力。

3. 从干部政策上来检讨，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优秀干部长期使他们闲散着，并常常打击一些干部；指出应对干部加强教育、帮助

简单地撤换调动的作法必须纠正，绝不能任意打击干部。

1936 年 10 月 21 日，彭真依据他广泛深入地调查了解所收集到的情况和所收到的 18 份意见书，写了《根据党的新策略来检讨北平工作》的文章并在北方局党内刊物《火线》上发表。彭真在调查研究中注意到，北平党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学生中，学生党员占了北平党员的绝大多数。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彭真采纳北平党内一些同志提出的“此后北平的学生运动最好由学生运动出身的学生同志自己来领导”的意见，向李葆华提议成立中共北平市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北平学委”），北平学委开始时由黄敬任书记，一个月后由蒋南翔接任。北平学委成立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职责由北平市委移交给北平学委直接领导。北平学联、北平民先队、全市各大中学校党支部统归北平学委直接领导。

1936 年 11 月，彭真代表北方局再次到北平，对北平党组织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刘杰任农委书记，李俊明任文委书记，蒋南翔任学委书记。

经过彭真一段时间的工作，北平革命形势明显好转。刘少奇在 1936 年 11 月 14 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最近“九·一八”纪念、双十节纪念、为反对日军演习罢课，赈济日军演习地点灾民（因日军演习中拆除了许多民房）参观二十九军演习、动员群众夹道欢呼二十九军穿城、援助绥远军运动，均能动员很多的群众，动作都合乎我们的原则。”

《教授对时局意见书》的签名运动由中立的教授发起，签名者已达数万人。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很活跃。民先应成为参加民族运动与一切进步的政治的运动，争取青年本身利益及教育与学习的组织，此组织准备发展到各地。

1936 年 12 月 5 日，在彭真直接领导下，北平、天津、太原、西

安、归绥、保定、洛阳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代表在天津举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工作的有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申府以及文化教育著名人士邢西萍、杨秀峰、张友渔、于毅夫和北平学联代表、民先队代表、天津学联代表等。会上讨论了抗日救亡运动组织的团结和援助绥远抗战等问题。彭真经常参加华北救国会领导人的会议，阐述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并对华北救国会的工作有所指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北方局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前未急于表示态度。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之后，彭真在北平找许德珩、张友渔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精神，说明释放蒋介石对避免引起内战，争取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张友渔、许德珩等党内外人士一致拥护和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并为团结抗战积极工作。

1936年1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改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彭真与民先总队长李昌直接单线联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成立的。1935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英勇地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响亮地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掀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的新高潮，配合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行动。游行示威后，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平津学生组成南下宣传团，深入冀中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后，1936年2月1日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在宣言中宣布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境”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等八大斗争纲领。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民先队不能公开表明她和党的亲密联系，发表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必要的。实际上，